

# 嘉兴城的『名人文化』



嘉兴是江南文化的重镇,名人辈出,水韵中心,一脉千年。图为嘉兴盐官古城。 资料图片

一座城市的风骨,往往藏在它的历史、文化地标里。茅盾、王国维、张元济、徐志摩、丰子恺、金庸……漫步于浙江嘉兴,总能与这些名人的故居不期而遇。

嘉兴这座被烟雨浸润的古城,从来不是单纯的水乡画境,更是一方孕育思想与才情的沃土。推开一扇扇名人故居的大门,如同翻开一部立体的江南文化史,在人与宅的对话中,读懂嘉兴独有的风雅与厚重。

本报记者 彭薇

## 一个街区的璀璨一隅

在嘉兴,有一条历史街区叫梅湾。它濒临京杭大运河河湾,临水而兴,历来是商贸繁华之地。

翻译家朱生豪的老宅便在东米棚下。朱生豪是中国最早致力于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人之一,在32年的短暂生命中译出莎士比亚的31个剧本。朱生豪不爱说话,曾自嘲一年中有一百天不说一句话,可他的热情与坚韧全部投入到莎剧的翻译中。战火中,他屡经译稿初毁、译稿再毁,又反复重译,甚至贫病交加,至死不渝。曹禹称他“功绩奇绝”。

从朱生豪故居出来,步行5分钟就到了一处幽静的小院,临大运河而建。这是中国水利专家汪胡楨的故居,小院由他亲手设计,命名“湖溪小筑”,有花木之胜。

在母亲的影响下,汪胡楨以第一名的成绩跳级入读中学,在兴趣与天赋的双重指引下,学习代数、解析几何、微积分等课程,为从事一生的水利专业奠定了扎实的数理基础。

汪胡楨一生搬过44次家,淮河、运河、长江、钱塘江等都留下他的足迹。尤其是佛子岭水库的建设,让他和

团队面临极限挑战,无图纸、无参考,只有当年就读于美国康奈尔大学时的课堂笔记。最终,水库有惊无险建成,并经历了多次自然灾害的考验,他也因此获得“中国拱坝之父”的美誉。

沈钧儒故居、褚辅成史料陈列室、金九避难处……梅湾街区上还有许多名人故居和遗址点。沈钧儒,从清末进士走到了新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第一任院长的位置。教育家陶行知亲切

地称他为“老头”,在一首诗中写道:“老头,老头!他是中国的大老;他是大众的领头……”这里的“老头”是一种温暖的符号,代表着可靠、坚定与担当,也是对沈钧儒“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”的革命情怀的生动概括。

## 名人书房的“天地之宽”

从嘉兴子城城墙往里走,有一栋

名人主题欢喜书屋,越走越感觉“天地之宽”。

一楼设了多间名人主题书房,比如茅盾书房、王国维书房、金庸书房、丰子恺书房等。每个书房内不仅陈列着名人著作与珍爱之书,还设置了书法临摹等互动环节,让人沉浸式地感受名人文化。

在金庸书房中,有一张金庸族亲图谱,图谱上的人物大名鼎鼎。

## 上海“新农人”探索农业“进化论”

控,就能自主完成精准转弯、障碍规避等作业;作业时的农机工作影像实时回传至数据平台,土壤、空气、水质等关键参数一目了然。

在更宏观的层面上,上海农业的数字化转型已经铺开。比如全市推广的“申农服”系统,农户实时上传生产数据,以此为基础实现产品全流程溯源,让上海农产品在全国大流通市场中,握住“安全溯源”这张牌。

科技投入离不开资金支撑,单纯农业生产收入往往并不丰厚,企业如何有动力“重仓”科技?调研发现,新农人的核心盈利模式,在于产业融合发展。36.1%受访者(116人)采取了这一经营策略,其中一半以上采取一三产融合经营,打造种养、文旅、社会化服务相结合的复合型经营模式。

位于青浦区的上海太来果蔬专业合作社从“一棵菜”起步,构建“种植一加

工一配送一文旅”立体格局,已成长为年收入达2亿元的农业集团。“农业常面临‘丰产不丰收’的困境,关键在于产业链后端薄弱。经营者必须主动对接市场,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。”合作社理事长王印说。

如今的太来合作社,早已告别“卖毛菜”,转而聚焦市场需求旺盛的净菜、色拉菜等加工产品——这些产品的价格,往往比毛菜高出3至5倍。“我们正在进一步扩大规模,建成4000平方米的净菜工厂和2700平方米的配送车间,引入酱泡菜生产线,打造融合参观研学功能的素食餐厅。”崇明万禾农场的经营数据,同样印证了“科技+全产业链”的价值:农场农业收入仅占总收入的35%,其余65%均来自深加工、文旅体验、碳交易等延伸领域。基于生产端的数字化体系,万禾农场将农业景观搬进都市商场,打造了2000平方米的综合空间,消费者能直接看到餐厅后厨的实时情况,尤其是崇明食材的溯源信息。

金庸的表哥是诗人徐志摩,姑父是民国时期军事教育家、军事理论家蒋百里,金庸的表姐夫是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钱学森,而著名翻译家穆旦是金庸的同族兄弟……除了钱学森,其他人都是嘉兴人。

著名文史学家曹聚仁评说蒋百里是“那时代的达·芬奇,有多方面的光芒”,“一生既为军事学家,又为政论家,也擅长文史研究,诗词都不错,字也写得很好,说话滔滔不绝,风趣横溢”。

蒋百里的影响远及海外,二战时艾森豪威尔、巴顿将军等国外军事家曾多次引用其军事思想理论来阐述战局。

中国文人有关欧洲文艺复兴的第一本著作就出自蒋百里之手。1918年到1919年,他受邀考察巴黎和会,游历欧洲,回国后不久著成《欧洲文艺复兴史》。他请梁启超作序,梁启超竟一发不可收拾,洋洋洒洒写了5万字,只好另作短序,将长序改写、充实,以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为名出版,又请蒋百里写序。

金庸书房的一隅,静静地摆放着几盒巧克力。金庸好友、作家倪匡曾说,查先生写《天龙八部》时书桌上总放一盒巧克力,写累便吃一粒,他说武侠江湖苦,笔下人物命运多舛,自己嘴里总要尝尝甜。一间间名人书房逛过去,看他们的笔墨人生,品他们的风骨与柔情,只觉心间漫过一层绵长的甜与润,清浅又熨帖。

## 大师心中的大师

在嘉兴,有一位大师心中的大师,有人称他是全才,也是通才。

他是沈曾植,是陈寅恪心中的“近世通儒”,王国维称他“是大诗人,是大学人,更是大哲人”。在沈曾植故居欣赏他的书法临帖,其对楷书、隶书、篆书、行书等无不精通。沈曾植长于史学,深于地学,邃于律学,精于佛学,湛于诗学,卓于书学。

他年少时便以文学名重京师,两代帝师翁同龢闻其考卷,称为“通人”。他是一位诗人,是清末“同光体魁杰”,更是一位综览百家、经世致用的学者。他深谙古今律法,被刑部尚书薛允升推为“律家第一”。大约同一时期,他开始研究边疆舆地,校正东北、西藏、新疆地图等。他还扭转以往集中元史补纂的学术倾向,从时空维度上开拓边疆史研究领域。

桐乡石门镇的丰子恺纪念馆,氤氲着质朴温润的气息,一如先生笔下的漫画,洋溢着对孩童的脉脉温情,对生活的款款热爱。

丰子恺画的皆是身边平凡事:燕子做窝,蚂蚁搬家,孩子用两个蒲扇当自行车骑……世间万物,在他的画笔下,充满人间的真情,又有大悲剧,让读者一见倾心。

丰子恺给他的故居取名“缘缘堂”。“缘”字既有他的老师李叔同(弘一法师)的建议,又有“缘上加缘”的师生情谊。其实,人与人、人与物、人与环境的相遇,皆是“因缘巧合”。

丰子恺一生最崇敬的人是李叔同,他一直都记着老师对他说的一句话——“士先器识而后文艺”。也就是说,读书人首重人格修养,其次才是文艺。

## 打造“文化名人群像”

嘉兴向来以文脉绵长著称,殊不知,在文人墨客的风雅之外,更有一群理工先驱,散发着求索理性的光芒。

嘉兴的水,淬炼出水利人的坚韧风骨。比如汪胡楨、钱正英(新中国任期最长的水利部部长)等水利学家,在江河之上筑起一道道屏障,护佑一方水土安宁。

嘉兴的土,更孕育出数学界的璀璨群星。李善兰、陈省身、吴文俊、钱宝琮、严敦杰等数学家都是嘉兴人。嘉兴为何早在清代就成为数学渊薮之地?这与清代重视算学分不开,而浙江又是数学研究重镇,数学家多集中在杭嘉湖一带。

如今,嘉兴更有意识地打造“文化名人群像”。嘉兴对于名人文化IP的塑造,不只是为了纪念,而是将它们变成可亲、可感、可走进的空间,举办可参与、可互动的丰富活动。

除了继续建设名人文化研究智库、推出相应研究成果、全方位提升和活化名人故居等,嘉兴还培育名人文化IP产业,推出名人故里游戏,开发名人文创产品等,让名人故居从历史的“静态陈列”走向当代的“活态新生”。

嘉兴的名人故居,不仅是建筑遗存,更是鲜活的文化坐标,是这座城市源源不竭的精神源泉。

(上接第1版)

畦园农场的马云富,最初因承接村庄规划项目踏入乡村,认识到景观设计与核心产业布局融合的核心价值,便辞去稳定工作转型乡村创客。“很多人不理解,但我看到了机会。”

有人是“闯入者”,也有人“归来者”。上海永胜瓜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周瑜从小跟着爸妈在地里种草莓,医学专业毕业后,先后在上海宝钢建设公司和金茂大厦从事白领工作。“大家都往城市里去,我却觉得农村有更大天地。”顶着外界的质疑,她回到家乡种草莓,以市场化思维推动品种迭代与产品创新。

## 理念革新

“现在在我们基地干活的农民,平均年龄都超过70岁了。”周瑜向记者坦言,她的草莓园曾从50亩扩张至300亩,最终却不得不收缩到100亩——核心难题只有一个:招不到人。

这并非个例,而是新农人群体普遍

面临的现实考题:一线劳动力从何而来?如何在行业中站稳脚跟、实现稳定盈利?

在农业领域,业内的目光往往投向荷兰。这个国土面积仅4.15万平方公里的国家,凭借高度现代化的农业体系,不仅实现了农产品自给自足,更是农产品出口大国。

其核心逻辑在于锚定科技力量:破解人力匮乏的行业痛点,提升土地产出效率,彻底扭转农业“既苦又累”的传统印象。

上海土是宝农业专业合作社“90后”理事长何杨阳,是这条路径的探索者。他从无人机植保切入,利用新技术、新技能开展社会化服务。而后他逐渐意识到,单一环节的科技赋能远远不够,要从根本上破解劳动力短缺矛盾,必须构建全流程的智慧农业体系。为此,何杨阳牵头开发农业数据一体化驱动平台,打造智慧农场,向长三角地区推广。如今,无人驾驶拖拉机无需农机手操

## 终于迁到山城重庆

武汉的局势严峻之际,国民政府军委会所属工矿调整委员会改组为工矿调整处,隶属经济部。1938年3月22日,工矿调整处召集武汉内迁工厂开会,决定各厂均放弃将武昌龟山和蛇山作为内迁工厂建厂基地的计划,讨论再度内迁事宜。会上各厂纷纷响应,会后各厂重新拆卸机器设备,准备再次迁移。吴羹梅在外办厂联系船只、起运和领取迁移经费,郭子春和章伟士则在厂里负责拆卸。

1938年4月,中铅再度迁移,由于厂里的大部分机器设备还封存在仓库里,仅有铅笔成品车间在生产,因此拆卸也容易得多。在接到通知的几天时间内,工厂便撤往宜昌。吴羹梅与郭子春同厂里职工一起搬,章伟士直接去重庆。

因为吴羹梅根据形势判断,认为宜昌不是久留之地,下一站将撤往重庆。迁移到宜昌后,在当地交通银行许经理的帮助下,中铅于帝王宫租到厂房,陆续恢复了笔芯车间、笔杆车间和成品车间。没有恢复的是铅笔板车间,因为中铅西撤前就已经备足了铅笔板,够中铅用一段时间。全厂职工一道努力,半年内,中铅就生产出100多万支铅笔,供应市场。

1938年10月25日,武汉会战失利,武汉沦陷,宜昌离武汉不远,受到直接威胁,内迁工厂在宜昌肯定是待不下去了,工矿调整处通知内迁工厂继续西迁。

刚刚稳定,仅维持了半年的生产又不得不停顿下来。中铅广大职工不分昼夜重新拆卸机器设备,装运上船,再进



# “笔”路蓝缕

## 中国民族铅笔制造业史话

徐鸣 著

一步迁往大后方——重庆。

从宜昌到重庆,也是走水路,分别经过秭归、巴东、巫山、奉节、云阳、万县、丰都、涪陵、长寿等10县,沿线有獭洞滩、青滩、滚子滩、泄滩、牛口滩、庙基子、东洋子滩、兴隆滩、抓滩等险滩70多处,其中以青滩、泄滩为最险恶,滩流湍急,暗礁丛生,船只要穿越险滩,随时有翻船人亡的危险。

由于内迁工厂都需要继续西撤,囤积在宜昌亟待运走的物资堆积如山,而运输能力却无法增加,运输成了一大难题。且时值长江枯水季节,一般江轮只能驶到宜昌。再上行,川江滩急水浅,除少数小型客货轮外,仅木船可以运货。

川江一带原来盛行一种白木船,这种白木船每只约可装运30吨货物,顺水下行日可驶300里,逆水上行无风日可行50里。后来由于浅水轮船的竞争,渐渐淘汰。工矿调整处武汉办事处主任林继庸请求川江航务处协助,重新启用白木船。航务处召集大小河流木船帮开会,决定租几百条白木船供内迁工厂使用。

从宜昌到重庆,水路全程1300里。沿途险滩75处,水流湍急,须由纤夫在岸上拉纤前行,速度很慢,白木船吃水

浅,所以过急滩时控制不好极可能倾覆。中铅运载货物的白木船,就是因为过滩时被浪涌入,发生两次翻船。所幸无人伤亡,不过还是有两成设备掉进江里没有打捞上来,损失不小。

经过职工齐心协力艰苦奋斗,全厂终于在1938年11月完好地迁到山城重庆,结束了为时一年半的颠沛生活。

重庆位于四川盆地的东南,北通汉沔,南达滇黔,不仅是控制川西、川东、川南、川北的要冲,而且是扼据云贵康藏的门户,在地缘政治上具有不可估量的战略意义。同时在经济地理上又是四川一大重镇,四方货物皆在重庆吞吐集散、储运运输。自1929年重庆正式设市以来,工商业更见发达,逐渐成为全国名城之一。抗战全面爆发后,国民政府于1937年11月20日迁到重庆,作为陪都,重庆又成为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、经济中心。

同时许多内地工厂也迁往重庆。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分别将这些内迁工厂安排在重庆的几个工业园区。其中较大的工业园区有长江上游的李家沱和嘉陵江上游的沙坪坝,那里集中了一些较大的内迁工厂,如刘鸿生的章华毛纺厂

## 更好“平替”家属,还有哪些题要解

(上接第1版)

### 队伍亟待专业化年轻化

“制度框架已搭好,现在缺的是人才”,多名医疗机构护理管理者如是说。据不完全统计,截至2023年上海有“灵活就业”护理人员7万余人,市场缺口还有5万余人。

中山医院护理部副主任陈敏向记者分析仁济医院12月初的护理员情况,以各科病区区的定岗护理员为例,离职率约3.89%、平均年龄约50.62岁,初中学历占比70%、高中及以上学历占比11%。虽然他们完成了基础护理业务的“脱盲”,但“离一些患者家属期望的专业化、高层次服务还有提升空间”。

张玉侠也提出同样担忧:尽管日常以生活护理为主,但相对专业化的一些业务,没有达到一定文化水平,很难完全领悟,学起来较为困难。能否吸纳更多专业人才?专家直言,行业现状对患护的双向选择均有壁垒。陈敏说,“我们在院内设置了操作考试,固定岗位的护理员目前考出五级有99人,三级有45人。”暂未推出一级、二级操作考试,是因为按现行收费标准,难以体现差异。她表示,如果后续在职业晋升、薪资标准等方面给予分级支持,有望推动更多年轻人加入这个行业。

### 回应患者多元需求

许多医疗机构还面临执行中的细节问题。

记者了解到,当下医疗机构陪护服务收款代码仅覆盖特级、I级护理。患者入院时可能被II级护理,不符合免陪护服务范畴;

接受手术后被评估为特级或I级护理后,可获得免陪护,但症状改善后又回II级护理。这导致患者家属一会儿要付费给医院,一会儿只能交钱给护工。如何统一免陪护的收费模式,实现便捷、多元又细分,值得有关部门进一步探索。

免陪护服务从试点拓展开来,除了扩大范围外,还应丰富内涵。业内专家提出,免陪护服务的更高层次是回应患者多元需求。除了生活护理外,情感需求、舒缓焦虑情绪等技巧也应加入到培训中,让护理员能更好“平替”家属陪护。

尝试已在悄然发生。在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,大专毕业的“00后”护理员夏米佳说:“我希望能用国际标准化的照护流程,守护患者最脆弱的时刻。”如今,她服务于七院重症监护室,成为推动免陪护服务升级的一名生力军。“我会主动向家属解释照护流程,同时为患者直言,行业现状对患护的双向选择均有壁垒。陈敏说,“我们在院内设置了操作考试,固定岗位的护理员目前考出五级有99人,三级有45人。”暂未推出一级、二级操作考试,是因为按现行收费标准,难以体现差异。她表示,如果后续在职业晋升、薪资标准等方面给予分级支持,有望推动更多年轻人加入这个行业。

市卫生健康委表示,未来将继续推动免陪护服务标准化、队伍专业化、管理智能化。期待免陪护服务进一步探索之余,在让患者家属得以喘息之余,为高质量医疗护理服务和百姓的高品质生活,注入更多内涵。

和章乃器的上川实业公司在李家沱,吴蕴初的天原化工厂和马雄冠的顺昌石粉厂在沙坪坝等。中铅在长江北岸的菜园坝,那里主要集中了一些中小企业,譬如沙千里的建国机器厂、重庆军布联谊社等。

联系厂址、安装机器等事务主要由章伟士负责。菜园坝新厂址原系“傅全福堂”房产,比上海斜徐路的面积大。承购新厂址时,工矿调整处给了一些补贴,所以中铅实际开支不多。厂址落实了,接下来必须协调流动资金、复工设备、供电等一系列问题。吴羹梅一到重庆,首先同交通银行重庆分行取得联系,以便于今后业务往来。随后他找工矿调整处,请求帮助解决设备缺乏、供电困难等难题。广大中铅职工不顾疲劳连续作战,中铅于1939年上半年复工。在内迁大后方的工厂中,中铅是复工较早的一家,同时也是大后方唯一一家铅笔厂。

几经磨难,中铅终于又开始生产了。当机器重新隆隆地开动起来,当成批的铅笔制造出来时,吴羹梅同全厂职工心情异常激动。但复工是一回事,正常生产又是另外一回事。电力供应不足是影响生产的一个重要因素。由于内迁工厂大量涌入,当地本来就不富余的供电能力更加显得紧张,而新建的发电厂又不能在短期内解决存在的问题,因此,中铅开工后,便接连不断碰到停电。时间久了,生产自然大受影响。到了1939年下半年,日军飞机惨无人道的轰炸更令中铅雪上加霜。

1938年10月日军攻陷武汉后,12月2日日军大本营对华中方面军下令开始向重庆实施“由空中入侵对敌军战略中核加以攻击同时进行中歼灭战”,目的是希望震慑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,打击中国人民抗战的意志。